

· 专栏 · 回眸 40 年，贯彻 19 大

GDP 与发展观

——从改革开放以来对 GDP 的认识看发展观的变化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 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从传统的忽视和否定 GDP,到改革开放以来运用和强调 GDP,再到进入社会经济发展新时代,提出“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对 GDP 的认识和态度的科学性,体现着我们对于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历史进程的变化,总结和剖析这一进展,对于我们清醒理解和科学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GDP 新发展理念 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1 JEL: A1 E0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既是经济增长与发展不断创造奇迹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对“发展”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提升其科学性的历史过程。其中,关于 GDP 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推动,集中体现了关于“发展”的态度及思考的转变。

一、GDP 的提出与我国否定 GDP 的传统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是到现阶段为止,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实践上表现一国或地区经济规模及其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也是现代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价值流量和存量进行全面计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进行宏观分析(包括结构分析)的基本根据和分析工具。

在经济思想史上,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主旨就是分析资源配置这一微观命题,并不包括宏观分析,也就不可能更不需要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功能的推崇,进而对政府作用的无视或排斥,因此资源配置是被作为市场微观活动的竞争过程,不是也不应是政府从国家国民经济总体干预的过程;另一方面,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存在再生产理论,特别是在其劳动价值论之外,又提出收入价值论,全部价值分解为利息、工资、地租三种收入,也就难以解释生产资料价值部分的客观存在,因而难以形成再生产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分析经济运行。在古典经济学中,虽然有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提出“经济表”力图从总体上反映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但是是极为粗糙的,还

谈不上深入系统和科学。^①

1929-1933 年大危机之后，催生了宏观经济学及国民经济总体核算和分析，大危机深刻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有限性，表明总量失衡的客观性，进而提出政府宏观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主义便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的集中体现。但要进行宏观分析，必须有国民经济总体核算和统计，这就提出了统计 GDP 及建立以此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历史要求。

构建 GDP 核算体系首先要明确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活动范围，在古典经济学中存在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争论，但到 19 世纪中叶，劳动价值论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效用（服务）价值论，以古典经济学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瓦解为标志，以及相应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对斯密古典经济学中原来就存在的收入价值论加以系统化再提出，效用价值论成为正统，^②并使之成为认识“产业”的理论基础。在这一价值理论基础上，同样也是为回应 1929-1933 年大危机，英籍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 1937 年出版《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直接获取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为第一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一产业；以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再加工以满足多样的物质资料生活需要为第二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二产业；以非物质资料形态的服务满足人们更复杂的物质资料生活之外的需要为第三阶段，相应的产业为第三产业。^③尽管费希尔以三次产业划分为根据的治理生产过剩总量失衡经济危机的政策未被重视，但其三次产业划分法却把“产业”概念拓展到工农业物质产品生产之外，尽管其对服务业作为产业的生产性的论证根据直接源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服务价值论（要素效用价值论），但却为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明确了“产业”范围，后来另一位英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克拉克发现并运用费希尔三次产业分类法，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国民经济账户进行重新划分，开始尝试构建新的核算体系，虽然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研究中断，但战后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重建很快引起了各方面重视。

战后增长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总量分析，对国民经济总体上进行核算，必须有较为系统科学的经济总量指标。20 世纪之后，特别是战后，对于经济总量及增长的统计计量和实证分析发展迅速，传统的国民经济统计迅速发展成为对国民经济流量和存量进行全面计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即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在这一体系中，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分析、资产负债分析等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账户体系，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成著名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成为当代进行经济统计和计量研究的国际标准和基本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也因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各种

① 参见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吉林出版社，1981 年版，上卷。

② 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篇。

③ 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事实上，费希尔提出三次产业划分的直接目的是从供给侧提出如何克服总量失衡（凯恩斯主义是从需求侧提出克服失衡的宏观政策），通过调整供给端的产业结构，适应人们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生活需求满足后的对服务的需求，把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从以往物质资料部门转移向服务部门，而服务部门的特点是不可能产生产品过剩，进而缓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由于供给调整具有长期性，需求管理则具短期性，所以各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而忽视了费希尔的供给改革。

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发展有关。^①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沿袭前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尽管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之后与斯大林之后的前苏联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在对“产业”的认识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上，仍沿用前苏联的体系，几乎包括全部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在理论上，以传统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理解为基础，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 GDP 的核算体系。其重要不同在于，不承认服务业的生产性即物质资料产品平衡表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物质资料产品占有核心地位，产业活动的统计和核算不包括非物质资料生产（服务业及第三产业），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为前苏联经济学家列昂惕夫，他早期进行的棋盘式平衡表研究，后来被发展成著名的投入产业表及分析方法。^②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长期采用以工农业生产总值等物质资料产品为核心的统计核算体系，除了在理论上以苏联式的理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统计核算上排除服务业外，否定 GDP 的价值和意义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一方面，长期忽视经济建设，特别是自“文革”十年浩劫以后，批判“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成为否定和忽视 GDP 的重要原因，否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然便否认国民收入统计和资源配置核算的重要性，自然会忽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地位，因此，那一时期对 GDP 及核算体系的排斥，本质上是否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某种反映。另一方面，长期对外封闭，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对外开放不足的封闭格局，使得我们难以在国际比较中推动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也难以以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分析自身的经济活动，这也是经济封闭性的某种体现。此外，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在于，GDP 核算体系是对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方式的反映，离开市场经济机制，GDP 既无统计核算的可能，也无必要，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以物质产品为核心进行统计核算，是有其计划经济的体制背景的。

二、对 GDP 的承认和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面临的突出发展命题是如何摆脱贫困？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深化和相应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发展、摆脱贫困成为共识，由此，GDP 的统计核算和以 GDP 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指标来规划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③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30 年里，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规

① 从上世纪 20 年代，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计量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到 40 年代理查德·斯通主持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研究，推动传统的国民收入统计研究发展成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也因此，库兹涅茨在 1971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通在 198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 列昂惕夫为此在 1973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1994 年 10 月第 2 版，《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划发展目标。^①

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针对大平正芳提出的：中国未来现代化目标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首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本衡量指标，指出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00 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使人均 GNP 达到 800-1000 美元，并特别强调为此要付出很大的努力。^②由此开启了围绕 GDP（GNP）为增长核心指标，以 20 年实现翻两番为目标的宏伟的增长发展规划，^③从全国的发展和增长规划，到各省市的经济规划，GDP 增长成为核心规划指标和考核指标，国家总体层面制定倍增计划，地方政府则展开相互间以 GDP 增长为标志的竞赛。从实践进程来看，我们在 1997 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较 1980 年翻两番的增长目标，继而我们又提出了从 2000 年起再用 20 年，再实现 GDP 翻两番的增长目标。事实上，我们在 2007 年提前三年实现了较 2000 年又翻番的目标，接着我们又将原来 2020 年较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提高为 2020 年较 2010 年再翻一番。到 2017 年我国 GDP 总量达 82.7 万亿人民币，GDP 年均增长达到 9.5% 左右，在世界 GDP 总的存量中所占比重从开始的 1.8% 上升至 15% 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2010 年起），在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量中贡献率达 30% 以上，人均 GDP 水平从开始的 250 多美元上升至 8800 多美元，从世界低收入水平（按世界银行标准划分，现阶段人均 GDP 1025 美元以下，共有 36 个国家）进入到下中等收入水平（人均 GDP 4055 美元以下，共有 54 个国家，我国是 1998 年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再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人均 GDP 4055-12200 美元，我国是 2010 年进入），克服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到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即进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跨越期，^④显然，在这一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增长的核心指标是围绕着 GDP 展开的，并以此进行的规划。

GDP 在中国的命运，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明确，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以 GDP 为核心指标规划增长发展目标，以推动 GDP 翻番增长来实现赶超，是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历史要求。二是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深刻体制变化，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推动市场机制的培育，从而为运用 GDP 进行统计和核算提供了必要的并逐渐完备的经济机制基础，GDP 说到底是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反映；另一方面，面向全球化的经济开放进程，使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比较，只能是日益国际化的进程，无论是国民经济核算还是发展目标规划，在指标运用和核算方法体系上只能是国际性可比较的，这就推动着 GDP 方法的运用。

① GDP 与 GNP 本质上是相同的核算体系，作为统计指标来说，两者的差距主要来自“国外要素收入”这一项，GDP 是按“国土原则”计算的，GNP 是按“国民原则”计算的。在西方国家，运用 GNP 有很长历史，在 1968 年联合国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之后，SNA 中运用的是 GDP，相应西方各国用 GDP 取代了 GNP，但由于 GNP 更强调收入，所以在世界银行公布各国收入水平时仍用 GNP，但改称 GNI，即国民总收入。

② 邓小平后来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本世纪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③ 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 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第一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18 页。

从统计核算方法本身的变化来说，中国接受 GDP 是经过激烈的理论争论的。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的生产性问题的争论，起因是围绕“生产劳动”展开的学术讨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劳动”范畴？什么劳动活动是生产性活动？除工业、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外，非物质资料的服务业是否属于生产性的产业？是否创造价值？争论的结果，在理论上虽仍未取得共识，特别是在其理论上，即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分歧上，难以做出科学的具有共识的论证。但是，在统计核算上，服务业开始被纳入产业范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在国民收入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我国逐渐统一到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上来，最初是在个别省市开展试点（如 1985 年开始的山西省），然后逐渐过渡，两套核算体系，即物质资料生产核算体系与 GDP 指标核算体系并行，最后统一于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7 年后），这就为以 GDP 指标来规划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以 GDP 体系来核算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统计核算指标和方法上的依据。

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避免地出现种种缺陷和不足，这种缺陷与不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GDP 增长及核算体系本身不是万能的，本身是有局限的，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和意义，不能将现代化发展的全部使命都压到 GDP 增长上；另一方面，对 GDP 增长及核算体系的运用，必须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脱离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盲目追求 GDP 的增长。盲目以 GDP 增长来替代和解释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特别是简单以 GDP 规模扩张、翻番式的倍增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式指标，往往可能引导经济发展扭曲。如果说强调 GDP 数量扩张在经济严重短缺、长期贫困的条件下，在经历起飞的准备阶段和初期，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也有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条件上的可能性，那么，当经济发展摆脱了贫困，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之后，其局限性就会逐渐显现，转变以 GDP 增长为引领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否则，很难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三、GDP 的局限与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毫无疑问，GDP 统计和核算体系有其科学性，这一体系的产生和不断完善，极大地提升了经济资源配置核算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作为一个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从国民经济活动的起点（生产）到终点（需求），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经过长期发展，这一指标体系已相当完善，或者说很难以其它指标来取代它。因而，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称，GDP 是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①但 GDP 体系本身确有局限或有限性，在运用这一体系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时，若忽视其局限性，必然产生严重的问题。

首先，GDP 指标从总量和规模上反映一国经济所达到的水平，包括总量和人均水平，作为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尽管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部门结构、投入产出结构分析，但是就 GDP 本身而言，强调的是最终数量，也难以直接体现国民生产总值背后运行中的经济结构差异。不同的经济结构可以有相同的 GDP 水平，规模领先的 GDP 水平也可能建立在极为落后的经济结构基础上，进而扭曲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所谓有

^① 参见保尔·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5 版，纽约，麦克吉尔出版社。Paul Samuelson and William Nordhaus, *Economics*, 15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GDP 确实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GDP 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经济增长但无经济发展，有量的扩张但无质的结构升级，有要素投入量增长的支撑，但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升，因为，增长更多的是规模扩张，即 GDP 的增长，经济发展更多的在于结构高度演进，结构变化是效率的函数，结构高度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发展的真正困难，也集中于结构性矛盾的克服。^①过于强调 GDP 数量增长，一方面可能忽略经济结构演进的重要性，忽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而过于依赖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张进而实现 GDP 扩张，并且，这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更容易成为政府短期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能引发和积累并加剧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从而使宏观经济短期失衡加剧，长期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其次，GDP 作为核算体系，反映的是一定时期（一年）经济活动中的流量，而国民财富是经济生活中的长期积累起来的存量，如果只有年度流量的 GDP，而无流量的有效持续积累，最终难以形成财富积累和国力的提升。尽管 GDP 作为核算方法提出了处理存量和流量关系的原则，但这一核算体系本身体现的主要是以年度为期限的流量性质的经济活动，即一年时间里创造的增加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差异并不是源自 GDP 体系本身，而是 GDP 在核算时的特点，但在运用 GDP 方法时，若忽略流量特征，甚至将其极端化，便会对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害，尤其是使经济活动目标严重短期化，不顾财富积累和可持续发展。^②

其三，GDP 核算体系，反映的是以货币价格计量的市场经济行为，未通过市场交易进而没有市场价格的经济活动是难以进入 GDP 核算统计体系的，但市场机制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机制，相当部分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并不通过市场或并不完全通过现实的市场机制进行，例如，军队、警察、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有经济资源的投入，也形成产出，但在原则上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又如家务活动，相当部分也未经过市场交易，其确切的市场定价也难以估算，因此难以客观全面地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进一步，如果片面追求 GDP 增长，大量非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容易被排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进而被忽视，形成严重“短板”，市场失效的领域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③

其四，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如果片面突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全面发展，必然扭曲现代化进程。因此，从国民经济核算来看，仅仅对 GDP 进行核算并以此规划发展目标是不充分的，核算和评价现代化应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和其他社会发展方面的核算和规划，比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与人们的幸福满意程度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需要处理但 GDP 指标体系本身难以反映的问题。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和改进中，人们又提出了“绿色 GDP”、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指标体系，以在理论上补充 GDP

① 例如中国 19 世纪上半叶 GDP 的规模占全球 30%以上，居第一位，但之所以 1840 年后迅速衰落，除其他原因外，在经济上重要的是结构质态落后，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仍以家庭小生产为主，相比较近现代史来的欧美国家的以产业革命为支撑的产业结构，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生产社会组织结构，存在质的区别，又例如当代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国，GDP 水平在总量和人均方面均处领先，但其经济畸形，因而严格地说属于高收入国家但不属于真正现代化国家，因而在划分类别时，往往不被作为“发达国家”，而是作为“石油输出国”。

② 投资一项目所有相关的经济活动会计入当年 GDP，但第二年拆除这一项目的全部经济活动同样会计入第二年的 GDP，但累积下来财富积累（存量）却为零，同时又在过程中（流量形成中）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损害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能。

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三次经济普查，从普查数据看，GDP 未能充分统计的部分主要是“服务”。

指标体系的不充分性，在实践上引导社会发展协调推进。^①

GDP 作为核算体系和方法的种种局限，在实践中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而人们不断的质疑 GDP 指标体系，并不断地完善这一体系。^②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处于极为落后的贫困状态，提出以 GDP 增长为代表的国民经济翻番目标，是有其历史客观性的。一方面穿越“贫困陷阱”迫切要求必须首先持续加快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在当时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比较而言，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等等相对处于次要地位，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相对还不十分尖锐，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尚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方面，因此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自中共十二大以后首次采取 GDP 价值量指标来规划长期发展目标，在实践上以 GDP 来制定增长和发展纲要，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可行性。^③必须看到，在跨越“贫困陷阱”的历史进程中，中国 GDP 的增长及相应规划目标的不断实现，为实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贯彻“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辩证唯物史观，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正是这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推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

问题在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系统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化，进而使得中国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使中国发展空前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目标，同时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 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 年）？沿用以往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能持续均衡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约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供给侧而言，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成本大幅上升，传统的成本绝对和相对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就需求侧而言，经济短缺，需求膨胀的市场环境已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取代；因而，无论是实现稳定均衡增长，防止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保障适度充分就业，还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全面成长，都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要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的高速增长轨道上，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推动的高质量增长轨道上来，这就需要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途径和方略。与此相适应，

① “绿色 GDP”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先进的理念，但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完善的并付诸实践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从生存状况、文化水平富裕程度三个方面反映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主要运用寿命、教育和人均 GDP 三个变量来分别反映。“幸福指数”是由世界价值调查（WVS）公布，通过调查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宗教等多方面问题，然后归结为：幸福吗？通过对受访者答案的统计处理得出各国幸福指数。参见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 版，第 17 章第 2-3 节。

② 例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就指出：“GNP 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也没有反映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 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

③ 中共十二大开始仍以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形式，提出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目标，后来又改用为邓小平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两番的表述，最后明确为按照国际通用做法，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方式来规划。参见：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 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第一章。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并特别强调，发展理念是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①党的十九大对“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及其贯彻又做出了进一步深入概括和具体部署，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深入结合，系统的阐释了解决新发展难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②

四、贯彻“新发展理念”与 GDP 增长

“新发展理念”是对以往出现的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根本纠正，也是对如何破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变化新矛盾的系统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③随经济成长，摆脱贫困陷阱后，突出强调以 GDP 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核算方法和行动规划的局限性逐渐显现，相应地我们党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大之后，进一步提出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综合协调，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形成“新发展理念”，到党的十九大，“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方面。^④客观地讲，“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要求，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出现经济“新常态”，以 GDP 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可能更低的速度转换的“换挡期”，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矛盾长期累积形成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从 2008 年全面反金融危机强力扩张政策轨道退出的“消化期”，“三期叠加”表明要求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要求极其迫切。

因此，树立并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与之相适应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而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的系统均衡性。那么怎样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怎样的方略实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全面均衡的现代化进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满足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⑤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怎样的内涵？重要的在于构建七大体系，即：建设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1-45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2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6 页。

④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阐释了“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则把“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构成，同时，相应地体现在宪法修正当中。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22 页。

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同联动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有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上述七个方面是统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包括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命题，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①进而，怎样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的统一中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之所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方面是由于无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主要失衡和微观经济中的突出矛盾均集中于供给侧，其深层次的动因主要源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突出的不同，或者说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其政策和改革举措的出发点不是需求管理下针对消费者，而是针对生产者，包括劳动者、企业、产业等，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竞争力和产业水平，基础在于创新驱动下的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政策和改革举措的落脚点不是需求管理下的总量效应，而体现在结构变化效应上，包括企业市场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演进。而这种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体现的效率和结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更深刻地体现了经济新常态下质量转变、动能转变、效率转变的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内在要求。之所以从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的统一中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概括而言即为一系列发展和一系列改革的历史内涵，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涵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包括国民经济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因此，其建设和完善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从供给侧入手以克服和缓解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那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经济环境和条件？必须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从短期宏观政策而言，需要保持稳定适度的GDP增长，使宏观经济在增长、通胀、就业等一系列指标相互协调，这就要求运用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加以适度调控，协调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否则，或者需求膨胀，经济增长过快，通货膨胀过高，对生产者也就失去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压力，进而不必进行；或者需求疲软，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不断攀升，对政府也就不具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可能，进而难于进行。从长期制度创新而言，需要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推进法治化进程，真正完善“私权赋予，公权约束”；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形成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治理结构，以在制度创新上支持“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即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是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上。”^②

显然，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及实践逻辑中，GDP增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

① 习近平在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学习现代化经济体系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1页。

是，不再通过单方面突出强调 GDP 指标的意义，不唯“GDP”，而是将其有机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系之中，强调统筹推进发展，不是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①二是，不再过于强调 GDP 增长的速度，而是实事求是地推动均衡增长，适应增长速度的换挡期要求；三是，不再突出要求增长规模扩张，而是要求增长质量转变，强调结构质态的提升；四是，不再突出总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扩张式拉动 GDP 增长，而是强调从供给侧入手，创新驱动寻求增长新动能；五是，不再相互独立地提出约束目标和增长目标，而是有机地把资源约束、生态环境约束等内在于经济增长，把改革、开放、发展统一于“新发展理念”；六是，不再强调 GDP 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的矛盾，进而不再突出强调增长效率优先，而是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强调 GDP 增长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民谋福利，而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建立才是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效率最深厚的根源；七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和规划理论方法及实践引导上，一方面使 GDP 核算体系本身更为国际化、更为完善和科学，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其本身的局限性，在以 GDP 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多方面、多维度的核算和规划国民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八是，不同地区和省市之间，不再倡导以 GDP 增速和 GDP 规模为引导的竞赛，而是要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区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实施不同发展方式，体现不同主体功能区要求，等等。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行动方略中，对 GDP 增长认识所体现出来的对发展认识的科学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深刻性，需要我们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是，必须清醒认识，我们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只不过是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现在人均 GDP 的水平不到 9000 美元，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302.4 美元，2016 年），距离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差距更大（41045.7 美元，2016 年）。^②即使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以人均 GDP 的水平而言，也只是达到当代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到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只是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只有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其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严重冲突、被根本否定之后，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都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过多少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因而，发展首先是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上全面赶超发达国家，始终应当成为首要的命题，而在这一命题的破解中，GDP 的增长始终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而言，而不是以“以人民为中心”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而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③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推动发展的方式和路径，而经济发展的初衷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80 页。

② 世界银行数据，参见刘伟、蔡志洲：《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结构升级》，载《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 期。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归宿应是为人民利益，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因此，GDP 的增长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发展观上，不“唯 GDP”不等于可以忽视 GDP，在国民经济核算上 GDP 指标有局限性，不等于它本身不科学，科学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三是，新发展理念强调“共享”，但并不是把做大蛋糕和合理分配蛋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强调经济增长和效率与要求公平分配和逐渐共同富裕并不是对立的，更不是损害了公平就可获得效率，降低了效率就可换来公平的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简单地把发展效率置于分配公平之上，显然并不正确，同样，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②因而，提高 GDP 增长效率和公平分配 GDP 之间不是对立的，更不是相互否定的，需要努力提升其相互促进的水平。四是，以 GDP 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从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端反映，宏观经济调控也可以从 GDP 所表现的供给与需求两端入手，我们强调现阶段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不是否定需求调控的必要性，更不能否定其重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③

总之，发展永恒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怎样认识发展？如何推动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科学的轨道，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就，是需要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向世界展现了“如何摆脱贫困”的中国智慧和方案，相信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再探索“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跨越之后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进程中，能够进一步贡献出中国的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真正确立我们的“四个自信”。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D]，1994 年 10 月第 2 版。参见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3. 习近平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学习现代化经济体系会议上的讲话[D]，《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
5. 保尔·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5 版[M]，纽约，麦克吉尔出版社，1995 年版。
6. 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M]，吉林出版社，1981 年版。
7. 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8. 刘伟、蔡志洲：《走下神坛的 GDP——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M]，中信出版社，2005 年版。
9. 刘伟、蔡志洲：《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产业结构升级》[J]，《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 期。

(H)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99 页。